

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

——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

蔡明諺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在討論台灣新詩史上的重要社團「銀鈴會」（1943-1949）的組織發展與創作特徵。銀鈴會是在1943年9月，由當時仍在中學就讀的張彥勳、朱商彝、許世清等三人共同組成，並且創辦日文刊物《ふちぐさ》。戰爭結束後，1948年5月，銀鈴會籌組中日文刊物《潮流》，此為該社同仁最為活躍的時期，至1949年因「四六事件」而停辦，銀鈴會亦被迫解散。本文透過原始刊物、報章材料，與國家檔案局的相關記載，說明了銀鈴會的名稱來源、組織架構、起迄時間等基本材料，並藉由《潮流》的實際編輯運作方式，與戰後初期銀鈴會同仁的相關文藝論述，重新檢討「跨越語言」的問題。本研究認為，銀鈴會同仁在文學創作與刊物編輯的具體實踐上，在當時部分消解了「國語」的正當性，甚至「跨越語言」的必然性。

關鍵詞：台灣新詩史、現代詩、跨越語言的一代、林亨泰

* 本文為科技部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研究（1945-1949）》（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6-070）之部分成果，初稿宣讀於「台灣文學研究新視野：反思全球化與階級重構」國際研討會，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14年10月24-25日。本文承蒙會議講評人及期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許多修改建議，僅此致謝。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New Poetr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 Case Study of GINREIKAI and “Trend”

Tsai Ming-Y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GINREIKAI, which was an important club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new poetry. GINREIKAI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43 by Chang Yen-hsun, Chu Shang-i, and Hsu Shih-ching, who were then still attending in high school and the founders of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 “Fuchigusa” as well.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n May 1948, GINREIKAI prepared and organized the “Trend” publication both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versions, and this also the period that its members intensively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Yet, “Trend” ceased publication and GINREIKAI was forced to disband due to “the incident of April Sixth” in 1949. This paper answers the name orig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of the club based on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s, press materials, and related document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Moreover,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so-called “Crossing Language Boundar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way of editing operation of “Trend” and relevant literary discourses written by GIMREIK’s member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paper argues that GINREIKAI’s members partly decreased the legitimacy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collapsed the inevitability of “cross language boundaries” throug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editing.

Keywords: History of Taiwan New Poetry, Modern Poetry, Generation of Crossing Language Boundaries, Lin Heng-tai

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

——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

一、空谷銀鈴

銀鈴會（1943-1949）是橫跨戰前與戰後台灣新詩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目前可知，在銀鈴會被迫結束後，台灣現代詩壇首次公開提及銀鈴會，是1964年12月，張彥勳在《笠》詩刊上發表〈荊棘之路：兼談創辦銀鈴會的經過〉。這篇較早的文章，提供了許多銀鈴會發展過程的重要訊息。首先，張彥勳是以「荊棘之路」自我表述同時代人的新詩創作歷程，這個象徵性的標題可以看出王白淵對日文世代詩人籠罩性的感染力。其次，張彥勳提及當時除了中部的銀鈴會外，南部另有葉石濤、葉瑞榕、陳顯庭組織的同人雜誌《處女地》。最後，張彥勳清楚地表明：

「緣草」由於語言問題，維持到三十六年才停刊了一段時期，繼而又於翌年五月間更名為「潮流」，復刊了。然而非常非常的不幸，因日本帝國主義五十年間的奴役政策，使得我們這一群愛好文學的年青人，一時無法使用著自己國家的言語來寫作，僅出了四期，只得廢刊了。¹

這是銀鈴會世代的「跨越語言」問題，最早的一段公開表述，並且提供了《緣草》正式停刊的時間（第二次停刊）是1947年，以及《潮流》創刊的時間是1948年5月。張彥勳後來的回憶，改動了早期說法，提出創刊號印出是1948年1月的「冬季號」。²文學史的研究者向陽採納這個的說法，認為應該以此供

1 張彥勳，〈荊棘之路：兼談創辦銀鈴會的經過〉，《笠》4期（1964.12），頁14-15。

2 張彥勳，〈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林亨泰編，《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06），頁23-32。

失的「冬季號」作為刊物的起始。³但是在上村ゆう美的研究裡，卻推論現存1948年5月印行的《潮流》春季號，應該就是最初刊行的第一號。⁴這個推論符合張彥勳在1964年的陳述，應該比較可信。

1978年5月，痲弦在《創世紀》詩刊「民國以來新詩史料初編」系列專欄中，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日文詩刊〉，該文以銀鈴會的《緣草》作結。其中提及《緣草》創刊於1943年，曾出十多期，1947年後改名為《潮流》，1949年停刊。⁵從痲弦撰寫的編輯前言來看，他的資料應該來自於林亨泰。這個早期材料對於《緣草》創刊時間的描述，同樣比較正確。近年來學界或是將《ふちぐさ》創刊時間繫於1942年，⁶或者設定於1944年，⁷恐怕皆有失誤。

八〇年代之後，由於張彥勳和林亨泰比較密集地撰文介紹，⁸銀鈴會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跨越語言），逐漸為人們所熟知。1995年1月22日，林亨泰主辦「台灣詩史『銀鈴會』研討會」；6月，會議論文集出版，⁹其中收錄銀鈴會同人的多篇回憶文字，和他們在四〇年代的作品選集，對於研究銀鈴會提供了初步的基礎。但是在此階段所發表的文章，大多是銀鈴會同仁的親身經歷與回憶記述，或是對作品的翻譯、介紹，或是對時代背景的感慨、評議，而較難展開具體的學術討論。

1995年6月，《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出版，楊翠執筆敘述銀鈴會的章節，奠定了往後數年討論銀鈴會的基礎，那就是在與楊逵的聯繫關係上，建立銀鈴

3 向陽，〈潮流〉，封德屏編，《臺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12），頁245。

4 上村ゆう美，〈銀鈴會の投稿活動〉，《日本台灣学会報》6期（2004.05）。頁8。

5 痲弦，〈民國以來新詩史料初編：日據時期臺灣日文詩刊〉，《創世紀詩刊》47期（1978.05），頁62-64。

6 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1。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頁247。

7 向陽，〈潮流〉，《臺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頁245。周華斌主編，〈編序〉，《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11），頁V。

8 張彥勳，〈從「銀鈴會」到「笠」〉，《笠》100期（1980.12），頁30-33。張彥勳，〈探討「銀鈴會」時代的重要詩人及其創作路線〉，《笠》111期（1982.10），頁35-43。張彥勳，〈銀鈴會「潮流」作品簡介〉，《文學界》16-17期（1985.11-1986.01），頁73-87，104-116。林亨泰，〈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自立晚報》，1985.05.04，10版。林亨泰，〈「銀鈴會」的史話〉，《臺灣文藝》118期（1989.07），頁6-12。

9 林亨泰編，《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

會的文學史地位。楊翠認為：「《潮流》的創作與評論也都與《邊緣草》時代有異，後者較著重於詩文之美的嘗試與品評，而前者則現實性、批判性較強，這種轉變與該會顧問楊達的關係相當密切」。¹⁰ 2002年，阮美慧發表〈銀鈴會的詩史位置之重估〉，這篇文章主要在勾勒銀鈴會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後來與《笠》詩刊的承繼關係。該文在撰寫時並未見到《ふちぐさ》或《潮流》的原件，¹¹ 由此可知早期階段在研究銀鈴會時，於材料取得上確實不易。

2004年，上村ゆう美發表〈銀鈴会の投稿活動〉，這篇文章整理、討論了銀鈴會會員在《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以及楊達主持的《力行報》文藝欄上，發表作品的情形。上村認為，銀鈴會活躍於台灣文壇約有一年的時間（1948.03-1949.03），他們作品的語言技巧並未成熟，卻能夠認識當時嚴酷的政治情況，描繪台灣陰鬱的現實，促進台灣文壇的重振。¹² 而銀鈴會與當時文壇的交流，特別是和楊達之間的聯繫，還可參閱陳建忠與黃惠禎的相關研究。¹³

2010年7月，張瑜珊完成學位論文〈「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這是學術界近年來對銀鈴會最全面，而且也是最深刻的討論。張瑜珊透過詳盡的作品分類和文本分析，試圖呈現銀鈴會成員的多重面貌，描述其創作所展現的複雜風景。為了挑戰既有的「線性」文學史敘事，張瑜珊高舉「抒情」和「邊緣」，豐富並且推展了人們對銀鈴會文學的理解。但與此相對的，對於「現實」的貶抑，以及對「潮流」或者「左翼」的疑慮，¹⁴ 則讓張瑜珊的論述在「並置」或者「流動」的「多義展演」中，似乎

10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06），頁210。

11 阮美慧，〈銀鈴會的詩史位置之重估〉，鄭炯明編，《越浪前行的一代：葉石濤及其同時代作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2.02），頁57。

12 上村ゆう美，〈銀鈴会の投稿活動〉，《日本台湾学会報》6期。頁20。 另可參閱其博士論文：大塚ゆう美，〈台湾の戦前と戦後を繋いだ文学活動：楊達と銀鈴会を中心に〉（日本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6.03）。

13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1945-1949）：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文化事業公司，2007.01），頁134-136。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銜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07），頁352-363。

14 例如其摘要與結論。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頁1、175-180。

偏離了銀鈴會文學所賴以「發生／發聲」的時代根源。

張瑜珊找到了國家安全局的「拂塵專案第十三卷附件」，內容為1950年銀鈴會遭到「查獲」的偵訊檔案，這是在既有的銀鈴會相關研究之上，最重要而且是卓越的貢獻。不過，張瑜珊沒有對這批檔案進行深入分析，而僅用以解釋銀鈴會部分同仁後來的際遇。但由於該案成立的時間（1950），就在銀鈴會解散後一年，因此當時的紀錄可以澄清很多後來紛亂的問題。例如，通常認為銀鈴會成立的時間是在1942年，這個說法主要是源於張彥勳後來的回憶。¹⁵但根據1950年12月25日，張彥勳在刑警總隊的偵訊筆錄，銀鈴會成立是在1943年9月，而且該文另有記錄，張彥勳從台中一中畢業的時間是1944年3月9日。因此銀鈴會成立時間，應以1943年較為合理。目前認為銀鈴會是在1942年組成的說法，並不正確。¹⁶本研究在張瑜珊所提供的基礎上，重新調閱並檢視了「拂塵專案第十三卷附件」，¹⁷希望藉此釐清銀鈴會在組織與發展上的情形。

2013年12月，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銀鈴會同人誌》（上、下冊），該書由周華斌主編，「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翻譯，黃意雯擔任計畫主持人，匯集整理目前僅存的《ふちぐさ》與《潮流》，進行重新排版與翻譯工作。《銀鈴會同人誌》的出版，為往後銀鈴會研究的開展與深化，提供了一個具體可信的基礎。而本研究正是在此前人的諸多努力上繼續前進，希望建立銀鈴會在文學史上比較清楚的位置。

二、ふちぐさ

銀鈴會是在昭和18年（1943）9月，由當時仍在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就讀的張彥勳、朱商彝、許世清等三人共同組織，而其同人誌《ふちぐさ》（邊緣

15 張彥勳，〈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23-32。

16 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頁1；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頁247；向陽，〈潮流〉，《臺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頁245；周華斌，〈編序〉，《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V。

17 主要檔案有：「銀鈴會之組織及活動情形」（檔號：0039/340.2/5502.3/13/002）、「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檔號：0039/340.2/5502.3/13/003）、「銀鈴案與匪偽台盟之調查資料」（檔號：0039/340.2/5502.3/13/004）。

草，或譯為：綠草、緣草），亦在此時創辦。¹⁸ 這個刊物就是後來《潮流》的前身。根據朱商彝回憶，《ふちぐさ》乃是由其命名。¹⁹ 1945年7月，曾因戰爭終結而停辦，1947年4月復刊。²⁰ 張彥勳後來回憶說：「日本戰敗，戰爭結束。銀鈴會繼續出刊以日文為主的《ふちぐさ》，²¹ 其所指稱者，應該是在這個時期。但限於材料缺乏，復刊後的實際發行狀況不詳，但約在該年底或隔年初旋即停刊。而從戰前延續到戰後，《ふちぐさ》共刊出十餘期。

目前可見的《ふちぐさ》僅存昭和20年「夏季號」，1945年6月20日由銀鈴會印行（在彰化第二青年學校內），主編為朱商彝（ひなどり生，雛鳥生）。會員共有15名，主要作者有陳茂霖（矢瀨卓）、張彥勳（路傍の石）、詹明星（似而非歌人）、許世清（曉星）、張慶坤（天涯生）、陳瑞峰（大地生）、清浦照雄（佗人）等。上述作者僅許世清沒有繼續參與《潮流》。

整體來說，《ふちぐさ》是一本綜合性的文學刊物，其內容包括童謠、新詩、散文、評論甚至「接力小說」（リレー小説）。但佔據主要篇幅並且逐期徵稿「課題」者，仍是短歌和俳句。張彥勳後來曾說自己的「詩創作受日本和歌與俳句的影響很大」。²² 而晚年朱實最鍾愛的文學寫作形式，也仍舊是短歌和俳句。²³ 從編輯形式來看，《ふちぐさ》和當時通行的短歌誌，是有相似的地方。例如殖民地時期歷時最久的歌誌《あらたま》，在設計上除了定期徵稿募集同仁作品外，也設置了針對同仁創作彼此評論的「月評」，以及「會報」、「消息」、「新會員介紹」等欄位。這些編輯策略同樣表現在《ふちぐ

18 國家檔案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張彥勳偵訊筆錄」（檔號：0039/340.2/5502.3/13/003）。

19 朱實，〈潮流澎湃銀鈴響：銀鈴會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11-22。

20 戰後《ふちぐさ》復刊的時間，在官方檔案中有兩種記載。張彥勳偵訊筆錄所說的時間是1947年4月，但台中縣警察局刑警隊的偵訊報告，在前文部分寫作1947年8月，而後文部分則與筆錄相同繫於1947年4月。本文所採用時間，根據張彥勳偵訊筆錄。國家檔案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檔號：0039/340.2/5502.3/13/003）。

21 張彥勳，〈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23-32。

22 楊翠，〈張彥勳訪談記錄〉，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合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06），頁263-268。

23 簡弘毅，〈跨越歷史的相會：專訪「銀鈴會」成員朱實先生〉，《台灣文學館通訊》33期（2011.12），頁128-131。

さ》，甚至往後的《潮流》上。

朱實曾經解釋說，刊物命名為《ふちぐさ》的理由是：「邊緣草是種在花壇四周的一種花草，它不顯眼，默默奉獻，襯托百花爭豔的花壇，寫意並不深奧，只是表示在這苦難的年代裡，我們三個人願在這小小的園地找到心靈的綠洲」。²⁴但是對於社團名稱「銀鈴會」的由來，當時的創辦者們後來卻沒有清楚的解釋。目前僅見的材料，是1950年12月25日，張彥勳在刑警總隊的偵訊筆錄。訊問人提出：「銀鈴會名何意，何人命名，如何發起？」張彥勳回答：「美麗響亮之意。是我與朱商彝、許世清三人商議命的名。我三人以互相研究文學，而由我發起」。²⁵

在1943年張彥勳等人創辦「銀鈴會」之前，台灣社會還存在過至少兩個以「銀鈴」為名的文藝組織。其一是鈴木貞子所領導的「銀鈴會」，這是屬於「新日本音樂」運動的邦樂團體，從1934年1月起，開始活躍於島內的各種場合進行表演活動。²⁶另外則是「銀鈴俱樂部」，1938年6月在台南發行刊物《銀鈴》，編輯兼發行人為根本虎雄。這是一本綜合性的文藝刊物，其徵稿內容包括：俳句、短歌、詩、川柳、俚謠、隨筆、漫文（雜文）、漫畫、長短篇コント（故事）、小說等。目前僅存創刊號，新詩的部份登載於卷首者，是丘英二〈五月の想念〉。丘英二，本名張良典，是風車詩社（1933-1936）成員。而風車詩社的領導者楊熾昌，則同屬於「銀鈴俱樂部」的會員。²⁷

目前所知的材料，無法建立1938年的《銀鈴》，與1943年的「銀鈴會」是否具有聯繫。但是《銀鈴》的創刊是採用了「銀鈴花」作為主要意象，並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代表台南的文學誌」。²⁸循此推想，則1943年「銀鈴會」命

24 朱實，〈潮流澎湃銀鈴響：銀鈴會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11-22。

25 國家檔案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張彥勳偵訊筆錄」（檔號：0039/340.2/5502.3/13/003）。標點為本文論者增改。

26 本刊，〈銀鈴會彈初め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01.14，2版。本刊，〈銀鈴會の彈初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01.12，7版。本刊，〈銀鈴會演奏會〉，《臺灣藝術新報》3卷4期（1937.04），頁5。本刊，〈新日本音樂皇軍感謝の夕〉，《臺灣公論》（1942.05），頁65。該社團在1936年以後的期刊上，登載名稱為「銀玲會」。

27 本社，〈銀鈴俱樂部會員氏名〉，《銀鈴》1期（1938.06），頁67-69。

28 根本虎雄，〈創刊の辭〉，《銀鈴》1期，頁3。

名的另外一種可能，或許也是把「銀鈴花」作為會名，而以「邊緣草」作為刊名。但是，作為同在「決戰下」綻放的文學園地，這兩個刊物在現實上就註定無法只是「純粹」的刊物。《銀鈴》的編輯者宣稱：「《銀鈴》並非專門研究文藝的機關誌。相較於（追求）文體上的華麗巧拙，具有真心的態度和令人感動的寫作之筆，才是我們更為想要的」。²⁹而表現在銀鈴會的《ふちぐさ》上，這群更為年輕但也更為直接地被投入戰爭前線的知識分子，就寫出了更多的翼贊國策的作品。

在現存的《ふちぐさ》裡，矢瀨卓發表的〈武士ぞ〉（武士啊）、路傍の石的〈撃ちてし止まむ〉（打倒敵人為止）、似而非歌人的〈痛恨賦〉、〈ヒットラー薨去〉（希特勒之死），以及轉載的論文〈戦争と短歌〉（坂口貴敏），都直接與戰爭下的軍國主義思想相關。這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似而非歌人（詹明星）的詩作。他的這兩首悼念希特勒之死的作品，充滿了入世的激情和右翼的色彩。他在〈痛恨賦〉（日文）中贊美希特勒：「您身在首都盡全部的勇氣來戰鬥／防衛宛如怒濤破近的紅潮水」。又說：「請將靈魂留在德國上空燦爛輝煌／摧毀布爾什維克民主」。³⁰但這樣的「現實」特徵，到了《潮流》時期，卻會有完全相反的發展，詹明星（後來改用筆名微醺）最後甚至與其他同仁的「現實」路線對立起來。

在《ふちぐさ》上，詹明星的另外一首作品〈花びんの悲しみ〉（花瓶的悲傷），同樣值得留意。因為這首詩的意象設計，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楊雲萍在1944年出版的《山河》詩集裡，兩首連續登載的短詩〈瓶〉和〈菊の花〉：

插在瓶中的花已枯萎，我不丟棄。／為的想看落寞之秋。／雖然那樣，
發白浮在湖心之亭喲，／竹林的高士已來訪嗎？〈瓶〉

空襲正般時，／我把菊花插在瓶裡。／炮聲，飛機呼呼聲裡，花微微在

29 N生，〈編輯者雜記〉，《銀鈴》1期，頁78。

30 似而非歌人，〈悲憤賦〉，「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76-77。

搖晃，／花卻在大花瓶中。〈菊花〉³¹

請比較詹明星在1945年所寫〈花びんの悲しみ〉（花瓶的悲傷）：

深深感到落寞且傷感的是，看到花瓶無花也無插花之人，被孤單地棄置在桌邊的角落。／讓人不忍且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是，看到已枯萎凋謝了無生意的花，淒涼枯槁地佇立花瓶之中，卻無人處理。／／“給我花”這應當不是花瓶想要的……。但是這樣放任不管的狀態，讓人深深地感受周遭人們內心中有某種不足之處。儘管花瓶已經發出悲鳴。³²

從這裡可以看出詹明星在詩作的意象和主題設計上，從楊雲萍那裡發展出來的關係。雖然詹明星捨棄了楊雲萍的「現實」背景（空襲），更為集中地突顯花瓶與人的「悲傷」，但這個悲傷也就是延續楊雲萍所寫的「落寞之秋」。應該可以說，至少在年輕的詹明星身上，銀鈴會同人在《ふちぐさ》時期和當時台灣新詩壇，還是有部分的聯繫。到了《潮流》時期，詹明星甚至積極地想要把這條日文台灣新詩發展的線索帶入銀鈴會，只是在左翼昂揚崛起的年代中，詹明星的努力最後還是失敗了。

最後，雖然在《ふちぐさ》上，銀鈴會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特點，確實是那些贊翼國策的作品。但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同仁「憤慨居士」，卻始終對此創作上的「政治」色彩，表達出清晰自覺的反省，甚至批判。在對前一期《ふちぐさ》的評論中，憤慨居士說：「《緣草》是在純文學的意圖下所創刊的，但因為戰爭與文學的關係而反映時局色彩，或許情非得已，我認為不甚妥當。但這也因見解而有所不同……。」³³而在日譯英文抒情詩的附記最後，憤慨居士

31 楊雲萍，〈瓶、菊花〉，葉笛譯，《楊雲萍全集》第一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02），頁124-125。

32 似而非歌人，〈花瓶的悲傷〉，「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82。

33 憤慨居士，〈緣草研究〉，「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92-93。

則是帶著嬉笑語氣說：（這首詩）「沒有戰爭的色彩，太好了」。³⁴ 這些文字都流露出明顯的「純文學」傾向，並且對《ふちぐさ》上服膺國策、表現戰爭色彩的作品表示了輕蔑。

還值得注意的是，憤慨居士在評價銀鈴會同仁的新詩創作時曾說：「新人大地生的〈花之道〉有北原白秋風格的情趣（我認為如〈柑橘花〉般，初期純粹的浪漫主義的溫和之作）。矢瀨卓氏的〈並列的瓶子〉，讓我想到子規和獨步」。³⁵ 從這個評價可以看出，憤慨居士主要是把銀鈴會同仁的作品，放在日本新詩史的脈絡中賦予定位，而不是在考慮台灣文學的問題。除此之外，在解說杜詩〈贈衛八處士〉的文末，憤慨居士曾說：「最近開始學漢詩。我認為我們必須具備漢文的基礎」。³⁶ 這是一段超越了時代限制的話語。這段話意味著，在決戰下的最終階段（1945年6月），年輕的、日文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自覺地重新學習「漢文」，甚至寫作「漢詩」。這樣的「跨越語言」狀態，在此時當然並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在銀鈴會「憤慨居士」這個極端特殊性的例子上，具有個別意識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學習漢文的嘗試，卻又是具體實在的現象。

在朱實所寫的〈會員近況〉中，對於憤慨居士的介紹是：「埋首於英國文學、中國文學，據說也懂音樂。他是吾人最佳的指導者」。³⁷ 這裡的「指導者」定位，在銀鈴會的發展中，是比較高的一個評價。往後在《潮流》時期，還曾經獲得這樣稱謂者，只有楊遠和詹冰。從這個「指導者」的描述，應該可以推知「憤慨居士」可能比朱實、張彥勳略微年長。而其自述來看，憤慨居士說自己曾經就讀「外語の語科」（外語的法文科），並且「自二中時期開始對

34 憤慨居士，〈戀愛索引〉，「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107。

35 憤慨居士，〈緣草研究〉，「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92-93。

36 憤慨居士，〈贈衛八處士（解說）〉，「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104。

37 朱實，〈緣草會員近況〉，「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36。

英詩有興趣」。³⁸從當時的習慣用語，以及銀鈴會所處的地緣關係來看，這裡的「外語」是指東京外國語學校，而「二中」則是指州立台中第二中學校。最後，憤慨居士的住所是：「鹿港街菜市頭八六一」。綜合以上這些線索，我個人傾向認為，憤慨居士應該是蔡懋棠。

鍾逸人的回憶錄曾說：「蔡懋棠不是別人，正是二二八事件後掩護謝雪紅逃入福州的人物。他是鹿港人，一九二二年生，台中二中畢業後負笈上京。……後來又轉入『東京外語』法文科」。又曾言及：「嚴輕音女士，她是古瑞雲摯友陳素吟小姐姨媽，二二八掩護謝雪紅、楊克煌、古瑞雲等人由彰化到左營找蔡懋棠的人」。³⁹根據古瑞雲的回憶錄，他和蔡懋棠、吳崇雄都是「台中師範學院北京語教師曹玉波的學生」，經由吳崇雄的介紹，因此認識陳素吟，並且相戀。⁴⁰曹玉波是從1944年起，在台中師範學院擔任「傭教師」（僱傭教師）。⁴¹陳素吟則是銀鈴會在《潮流》時期的主要成員，1924年生，彰化高女畢業，任職於台灣第一商業銀行彰化分行。四六事件後，朱實潛逃（在彰化），銀鈴會的第二期《會報》即改由陳素吟編輯發行，通訊處亦改為其工作的銀行。⁴²而林亨泰的第一本詩集《靈魂の産聲》，在印行時所需經費約一百萬元，陳素吟個人就樂捐了五十萬元助印。⁴³從這幾條材料來看，蔡懋棠和銀鈴會是有可能建立聯繫關係。當然這個關係能否確立，還需要更多材料來證明。

整體來說，《ふちぐさ》是一個以中部地區年輕知識分子為主的文藝同人誌，他們的組織發展雖然隨著彼此從中學校畢業，擴展到各自就業的單位（例如彰化第二青年學校），但終究保持在比較小的範圍內，沒有太大的發展。這

38 憤慨居士，〈山的那邊〉，「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94-95。

39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冊（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12），頁205、649。

40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台北：人間出版社，1990.09），頁15、47、39。

41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署職員錄》（台北：臺灣總督府，1944.01），頁244。建檔日期為1944年1月1日，前此《職員錄》（1943年7月1日建檔）並無曹玉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查詢日期：2015.04.01）。

42 錦連，《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09），頁62。

43 朱實，〈文藝通訊〉，《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347。

個工作將有賴於朱實到台北讀書後，藉由他的居中聯繫，才迅速擴充了銀鈴會的成員。1946年秋天，朱實進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專修科就讀，此時已經是二二八事件的前夕。

三、夢與現實

《潮流》是銀鈴會在1948年5月復刊的同人誌，至1949年4月印行「第二年第一輯春季號」為止，《潮流》共有五期。另有兩次「聯誼會特刊」（1948年8月、1949年3月），以及兩期「會報」（1949年3月及5月）。

整體而言，《潮流》是以省立師範學院的本省籍學生為主要班底，所建立起來的中、日文合刊之學生刊物。當時朱商彝（朱實）、林亨泰（亨人）、陳金河（埔金）在教育系專修科，蕭金堆（淡星，另有筆名蕭翔文）在史地系，許育誠（子潛）在體育專修科，賴裕傳（籟亮）、張鴻飛（南十字星、松翠）則是在英語系專修科。以上這些參與者（包括後來的錦連），都是朱實在師院時期所活動引進的成員。與此同時，綠炎（詹冰）透過詹明星的聯繫，⁴⁴進入銀鈴會，但原《ふちぐさ》時期的會員詹明星和奈穗美（なほみ），卻轉為「後援會員」（讀者）。⁴⁵

《潮流》的主編張彥勳，曾經在1948年5月「春季號」上，解釋刊名的來由：「潮流是因滿潮而引起海潮流動。時勢的趨向。時勢的趨向即光復後台灣青年血脈之流動」。⁴⁶朱實則是在隔期的「夏季號」上（1948.07），以中文創作〈卷頭詩〉：大時代的潮流奔流著，／一切在混濁中奔流著，／貪官污吏、／荒淫無恥，／自私自利，／這一切的一切！／／在時代潮流的翻弄中，／創造出時代的——是青年／時代的光明，／時代的力量，／時代的良心，／新時代由潮流中誕生！⁴⁷從這裡可以看到銀鈴會兩個主要負責人，他們

44 微醺，〈寧靜的熱情：綠炎兄二三事〉，「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96-99。

45 紅夢，〈通告〉，「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157。

46 紅夢，〈編輯後記〉，「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12。

47 朱實，〈卷頭詩〉，「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17。

所共同強調使用的概念是「青年」和「時代」（時勢）。而在後來楊逵的眼中（1948.06），這兩個關鍵字將被更為抽象地置換成為「夢」與「現實」。⁴⁸而此二者的矛盾與辯證，往後將成為支撐《潮流》前進的主要動力。

事實上，在1948年5月的創刊號上，人們就可以感受到兩種面貌迥異的作品。該期的開卷作品是綠炎（詹冰）的〈私·私·私〉（我·我·我），這首詩的前三個小節是：

我把我／裝入我的手槍。／為了瞄準自己。／／在泥濘的道路，／我的
鞋子努力地不想弄髒。／不知何時，我含著淚水。／／在我體內有座
電梯。／載著我的靈魂，／時升時降。⁴⁹

非常冷靜而且知性的現代風格，充滿詹冰日文詩作的風采。在形式上，第一小節因為翻譯的關係略有語言的隔閡，實際上其每一行的開頭都是「私」（我），這也是詩篇名稱的來由。內容則充滿個人式的、悲劇性的色彩：「我」既是謀殺者，也是被謀殺者，同時也是謀殺的工具。第三小節的「電梯」（エレベエタア），原文因為使用片假名，在視覺上有突顯的效果，而且第一行的音節數因此特別長。對照次兩行簡短的音節（末行兩句排比）：「私の魂をのせて、／昇ったり、降ったり。」則個人體內封閉著、升降的靈魂，更顯得急促動盪。這是充滿個人風格的，非常自我抒情的作品，而且是知性的、金屬性的（手槍、電梯）抒情。

但是銀鈴會的負責人朱實，同樣發表在1948年5月「春季號」上的作品，就完全是另外一種風情。這兩首朱實的作品，緊跟在綠炎詩作之後，而第一首原是以日文發表，第二首則是用中文寫成：

將老舊的詩稿／放入忘卻的火裡／燒掉……／重新創造／戰鬥的／詩

48 楊逵，〈夢與現實〉，「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90-291。

49 綠炎，〈我·我·我〉，「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127-128。

吧。〈年頭感〉

你們是／變態社會的產生物！／也就是／文明社會的畸形兒！／／「凋落」／飄在你們／顯明的紅唇上……／／「惡毒」／佔在你們／軟弱的身體上……／／從你們／歡樂似的笑聲中／我／可聽見／你們心中悲慘的哀號！〈淪落的人群〉

朱實的詩作，是明顯充滿現實與戰鬥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首用日文所寫成的〈年頭感〉，應該是朱實「轉向」的宣告。人們由此可以回想起，在《ふちぐさ》時期的「ひなどり生」，在那冊充滿決戰色彩的年輕詩集中，朱實曾經是與時局保持最適當距離的人，即便是他寫〈航空隊的哥哥歸來〉那樣的詩作，⁵⁰ 都還是洋溢著年輕、浪漫的青春氣息，而沒有顯露出多餘的戰爭（現實）氣味。但是在《潮流》一登場，朱實就宣告他的轉向了，而這個轉向是在楊達加入之前。楊達是在《潮流》第二期之後，才獲邀加入銀鈴會。⁵¹

至於朱實發表的中文詩作〈淪落的人群〉，其所描寫的主題是淪落風塵的女性。這在第二小節的「凋落」（花朵）和「紅唇」意象上，應該表達了足夠的喻意。朱實的中文在這裡得短拙、生澀，這個現象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也應該獲得足夠的諒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朱實在此詩作中，所展現的對於「現實」的直視，尤其是對中下階層女性的關注。人們可以比較稍後在1948年「秋季號」上，亨人（林亨泰）所寫的同樣使用「紅唇」意象的詩作：

現在就要開花／這一群充滿夢想的少女們／據說已經成為教員了／／上妝技術還不熟練的臉龐上／清澈的雙眼閃爍著天真爛漫的光輝／聽說已經當上教員了／就像跟母親撒嬌般地／紅唇上的波浪忽大忽小／聽說已經當上教員了／／這一群觀音菩薩／在意著頭上輝煌的光環〈剛出校門

50 朱實，〈航空隊的哥哥歸來〉，「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65。

51 紅夢，〈編輯後記〉，「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332。

的女教員〉⁵²

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出，雖然都是在表達「現實」主題，但亨人的視線所投注的方向，明顯和朱實並不相似。銀鈴會較早的（1948年夏季號）對於亨人的介紹詞是說：「新進詩人，也是心理學專家。結合哀愁的浪漫與美麗的格調，打動人心」。⁵³ 林亨泰正是擺盪在這種浪漫與美麗的格調中，逐漸凝塑出對現實的試探和描摹。他在《新生報》「橋」副刊所發表〈山的那邊〉、〈按摩者〉（1948.04），以及1949年在《潮流》春季號上，所發表〈為桃色所虐的女子〉，⁵⁴ 就是屬於更為傾向現實的作品。

我個人認為，在銀鈴會同仁中，林亨泰是擺盪在「夢與現實」之間，最為不穩定的例子。和他比較起來，朱實、淡星、埔金和籟亮明顯地站在現實的一方，而微醺和綠炎則始終守護著夢的領域。但林亨泰卻如同自己在此時所寫出的名篇〈黑格爾辯證法〉那樣，⁵⁵ 「正、反、合」式地搖擺在「夢、現實與詩」之間。並且隨著時間的延長，林亨泰的「詩」將更多地向「夢」的領域接近。

於是當1949年2月《會報》第一期刊出時，淡星就直言《潮流》上已經出現「歷史的現實」與「觀念的現實」這樣兩種潮流：

屬於前者的有紅夢、朱實、有義、埔金、鴻飛、子潛、松翠等，屬於後者的有綠炎、素吟、亨人、雅得、真砂等。歷史現實派的詩作易懂，誰都能理解。觀念現實派的詩作，作者必須在心中發展已經先在韻文中萌芽的東西。⁵⁶

52 亨人，〈剛出校門的女教員〉，「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370-371。

53 朱實，〈會友音訊〉，「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82-284。

54 亨人，〈為桃色所虐的女子〉，「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221。

55 亨人，〈黑格爾辯證法〉，「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222。

56 淡星，〈兩種潮流〉，「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187。

雖然淡星努力想要調和這兩種潮流，並且在更為抽象的「理想的現實」（信念與意志）上，將這兩種「現實」重新結合起來（這就就如同林亨泰的〈黑格爾辯證法〉所描述的那樣）。但是這樣的努力最後是否能夠成功，已經無法得到歷史的證明。

四、潮流分歧

經過1948年的發展，銀鈴會的同仁自覺地發現彼此的不同，並且至少形成了在「歷史的現實」與「觀念的現實」這兩條路線上的差異。這個差異最初可以推及《ふちぐさ》時期，此即「憤慨居士」所提出來的「純文學」意識，但同樣明顯地表現在整個《潮流》的發展過程裡。人們普遍地知道，《潮流》在第二期之後，延聘楊逵作為銀鈴會的指導者，這主要是張彥勳和朱實兩人居中聯繫。但與此同時，就是在《潮流》刊出楊逵文章〈夢與現實〉的同期，當時正就讀台灣大學的詹明星，也曾經想要接續另外一條台灣新文學的傳統進入銀鈴會：那就是任教於台大歷史系的楊雲萍。

還是在《ふちぐさ》時期，詹明星（似而非歌人）就顯露出對於楊雲萍詩作的熟悉。而在《潮流》1948年7月的「夏季號」上，微醺撰文推介楊雲萍：

老師的話不是循序漸進而是瞬息萬變。他那天才型的思索，超越了形式論理的程序，或高度昇華，或潛入萬仞深谷。對我而言，斷斷續續地脫口而出的言詞的連結，感覺就像無韻的詩歌。我將談超現實主義的詩與佐藤春夫的老師，當成是活生生的詩歌來欣賞。⁵⁷

如果把微醺在這裡所描述的「瞬息萬變」、「天才型」、「超現實主義」和「活生生的詩歌」，拿來比較楊逵在同樣這期《潮流》上說：「必須培養觀察社會的正確眼光，深入地考察現實，決定真正的社會指針。然後必須成為人民

57 微醺，〈詩人的味道〉，「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30-233。

的先驅，勇敢地鬥爭」。⁵⁸那麼應該可以直接地感覺到，這是兩種爭鋒相對的文學觀念，而此時並列地存在於銀鈴會之中。

從〈詩人的味道〉這篇文章看起來，當時正在台大政治系就讀的詹明星，已經組織了另外一個讀書會，並且延請楊雲萍每週蒞臨指導。但是從現存的楊雲萍史料中，對於這個團體的性質與內容尚無法了解。楊雲萍與楊達最早的交集，還是在「東京台灣青年會」時期（1918年成立），當時這兩個年輕的留學生，都被視為是傾向共產主義一派的學生。1927年「社會科學研究部」攫取台灣青年會領導權時，楊雲萍也曾獲選為研究部員。⁵⁹只是1933年楊雲萍回台之後，他就投入南明史與民俗文化研究，並且活躍於台灣文藝家協會與民俗台灣社，而對早年的經歷絕少言及。

然後就出現了在《潮流》1948年「夏季號」上，詹明星在描述楊雲萍時，所記錄下的一段饒有趣味的文字：

「我寫詩並不是以思考來創作。雖然聽來不高尚，但就像大便一樣。忍不住時就會出來。」老師這麼說時，露出一副滿足的樣子。我曾經苦吟推敲，創作詩歌，雖然僅是一瞬間，但我似乎看到詩的本質。⁶⁰

在轉述這個片刻的經驗時，詹明星所側重的是活生生的詩人，或者可以說，他從楊雲萍身上所看到是「生活」的詩。而這就是詹明星的文學，所設想追求的「現實」。但人們透過詹明星的視線，其實並不一定能夠真正讀懂，楊雲萍在這裡所想要表示的意思。換句話說，對於「創作如同大便」的描述，楊雲萍究竟是表示贊同？還是嘲諷？

對於詹明星來說，楊老師的滿足的表情，顯然是自然、生動而且真誠的，因為這就是詹明星所認識到的「詩的本質」。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楊雲

58 楊達，〈夢與現實〉，「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90-291。

5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東京留學生の社會科學研究〉，《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文化事業公司，1995.06），頁38-40。

60 微醺，〈詩人的味道〉，「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30-233。

萍這個輕描淡寫的動作，卻會讓人聯想到1943年發生的著名論爭，那就是「糞リアリズム」（糞現實主義）。⁶¹在已經過去的那場論戰中，楊逵高舉著〈擁護糞現實主義〉，⁶²批評西川滿的觀點。而楊雲萍卻比較委婉地說：「西川滿寫了〈文藝時評〉，他想要說的筆者不是不能理解，但這個〈時評〉引起了很多的『誤解』」。⁶³楊雲萍曾經間接地對西川滿主張學習「泉鏡花」表示反對，⁶⁴但卻沒有論及西川滿所提的「糞現實主義」。

如果從過去的立場回顧起來，楊雲萍藉由與學生的對話，諷刺性地批評了楊逵的文藝路線，似乎也不無可能。只是年輕的詩人恐怕不能體會老師更多的深意，並且自顧自地朝向「另一種現實」飛奔而去。於是在《潮流》1948年「冬季號」上，綠炎（詹冰）透過「會友介紹」的系列專欄，撰文支持詹明星，並且旗幟鮮明地批判現實主義：

如今，舉世的文學之徒，聚集在「現實」的旗幟下……，是怎麼回事？我們的純情詩人；微醺君，在其〈癩文學〉中說道：「普羅文學曾經試圖傾力暴露無產階級者的痛苦。然而這些少數的漢生病文學，毫不作作地，把他們所有一切攤在我們面前。比起前者，這些作品自然的表現，不禁有難以表述的種種感慨。」現在，把這「普羅文學」一詞，換成「現實主義文學」應該也不違背微醺君的意志吧。沒錯。他才不需要故意、勉強暴露現實的醜惡，順從他的天性、以詩人的感覺來追求、啟示理想，或者以他的純情創作清新作品，洗滌滿是泥濘的人心，我想這才

61 關於此論爭請參閱曾健民，〈評介「狗屎現實主義」論爭〉，《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頁109-123。垂水千惠，〈「糞realism」論爭之背景〉，《越浪前行的一代：葉石濤及其同時代作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2.02），頁31-50。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05），頁456-469。

62 楊逵，〈糞リアリズム〉，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台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2011.12），頁110-118。

63 楊雲萍，〈文學奉公會其他〉，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第二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02），頁205。

64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作為「浪漫與幻想」的日本小說家泉鏡花，曾經在1911年出版小說《銀鈴集》。這是個讓人不得不注意的「巧合」。

像是他的人生風格吧。⁶⁵

在綠炎的文學觀念裡，發揚自我的個性比揭露醜惡的現實更為重要，這應該可以抽象地理解為是支持「表現論」，而否定「反應論」。這是《潮流》刊物上，最為清楚地「反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立場。論戰正是由曾經作為「指導者」的綠炎在此展開。「冬季號」之後，1949年2月《會報》第一期上，立即出現了「筆戰」專欄。首先刊出者，是前述淡星〈兩種潮流〉，其次就是微醺〈關於《潮流》的方向〉：

我們的《潮流》，近來愈發呈現強烈的單一潮流。沒有批判、被動地依附某種立場是認真的態度嗎？不要輕易與現實妥協。以柔軟且強韌的批評態度，唯有如此的劃一，才應該是我們的潮流。我反對《潮流》成為某種立場的機關雜誌。⁶⁶

詹明星在此雖然沒有明確說出來，但他所批判確實是《潮流》左傾的現象。可以作為參照的是，1948年「冬季號」曾經刊出署名「王麗花」的讀者投書，其中言明：「美麗的台灣，應該以樂園或蓬萊島而出名，但在〈秋季號〉上，似乎都已貧民窟為背景，描寫落魄者的生存與競爭」。⁶⁷這裡對於刊物的集體傾向所表示的批評，基本上是一致的。

「筆戰」之後，《潮流》的文藝路線爭執，已經延燒成為不可逆的戰火。即便到最後，詹明星宣稱可以接受「藝術為人民服務」，也表示並「不反對」現實主義，但他還是「無法苟同，只把藝術看做滿足人類情緒，甚至只是政治手段」。⁶⁸但也就是在這最後一期的《潮流》上，詹明星面對的挑戰是強調

65 綠炎，〈介紹純情詩人：微醺君〉，「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90-92。

66 微醺，〈關於《潮流》的方向〉，「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187-188。

67 王麗花，〈讀者的聲音〉，「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107。

68 微醺，〈人民、現實、藝術〉，「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241-246。

「階級立場」與「領導權」的籟亮（賴裕傳），⁶⁹以及主張「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埔金（陳金河）。⁷⁰

應該可以認為，銀鈴會同仁在整體上是更多地傾向左翼的現實主義文學。四六事件後，1949年7月1日警備總部發佈通緝命令，其中朱商彝的案由即為：「銀鈴聯誼會出刊潮流主編言論反動思想左傾」。⁷¹1950年6月13日，在《ふちぐさ》時期即為銀鈴會同仁的陳瑞豐（大地生、白光）被捕，他曾經供述說：「銀鈴會負責人張彥勳、朱商彝等認為當時政府無能，大家失掉了信心。尤其朱商彝每次談話中聲言要領導大家來描寫現實，日久不免有人左傾。後來彼等與《橋》的主辦人及作者發生了關係」。⁷²從這些材料上，都可以看出銀鈴會的主要傾向。如果套用淡星在1948年8月「第一次聯誼會」上所提出的「七三主義」：亦即「反應現實的作品七，抒情的作品三」。⁷³那麼我們應該也可以說，銀鈴會的《潮流》最後所塑造出來的文學論述和新詩面貌，大約也就符合這樣的比例，而不應該是「抒情與寫實並置」。⁷⁴

五、超越語言

戰前銀鈴會的《ふちぐさ》，是在1945年7月停辦，究其原因可能是日本宣布投降（1945.08）。戰後，《ふちぐさ》在1947年4月復刊，但旋即停刊，則其終止與報刊禁用日文的官方政策（1946.10），並不直接相關。因為很明顯，《ふちぐさ》的復刊，是在禁用日文之後，甚至已經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張彥勳後來將《ふちぐさ》停刊，歸諸於報章雜誌禁用日文政策，⁷⁵但是《ふちぐさ》並非登記有案之出版品，復刊後的《潮流》亦繼續以日文刊行，

69 籟亮，〈真實性，藝術性及領導性〉，「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268-273。

70 埔金，〈文學隨感〉，「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326-330。

71 台灣省政府，〈電希轉飭嚴緝奸嫌曹潛等廿名歸案〉，《臺灣省政府公報》秋字3期（1949.07.01），頁37。

72 國家檔案局，「銀鈴會案之組織及活動情形」（檔號：0039/340.2/5502.3/13/002）。

73 朱實，〈銀鈴會第一次聯誼會記錄〉，《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347。

74 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頁176。

75 張彥勳，〈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23-32。

因此《ふちぐさ》的停刊是否受限於禁用日文的官方政策，似乎應該重新考慮。⁷⁶

或許應該反過來問：日文刊物《ふちぐさ》為什麼會在1947年4月復刊？這應該還是受到二二八事件（1947）的影響。許雪姬既有的研究已經表明，二二八事件時台灣曾經短暫地恢復成為日文的世界，而「禁說日語、禁用日文隨著民國36年5月16日解嚴及新任省主席魏道明的到來，有寬鬆的趨勢」。⁷⁷二二八事件確實讓銀鈴會的組織，重新活躍起來。在事件期間，銀鈴會的主要同仁陳茂霖（矢瀨卓，張彥勳妹婿），以及張彥勳的二弟張彥哲，都在台中參與了反抗運動。⁷⁸因此，日文《ふちぐさ》的復刊，應該可以放在這個背景底下理解。雖然這個日文管制相對「寬鬆」的階段，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

從戰後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來看，銀鈴會在1948年5月創辦《潮流》，其最重要的特點，就在於編輯形式採取「中日文合刊」。但是這樣的編輯形式，在戰後初期並無特殊，甚至往後延伸到五〇年代，也非孤例。何義麟的研究顯示，二二八事件之後，報紙日文欄正式恢復，在1948-1949年之間，省政府經營的《台灣新生報》，與國民黨經營的《中華日報》，都曾經以「附刊」的形式發行日文欄。⁷⁹而在1950年6月1日，國防部總政治部還曾經發行《軍民導報》，這是一份全日文出刊的軍報。與此同時，台灣省政府還以日文刊行針對原住民閱讀的《山光報》和《國民導報》。⁸⁰1950年8月7日，台灣省政府公告：「台東縣《台東新報》以中日文對照刊行山地服務欄（佔報紙全面積八分之一）經本府於本年一月廿五日核准延長使用一年，姑准至本年底撤除日

76 例如藍博州、周華斌皆認為，禁用日文政策是《ふちぐさ》停刊的原因。參閱藍博州，《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中：晨星文化出版社，2000.04）。頁300。周華斌，〈編序〉，《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V。

77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思與言》29卷4期（1991.12），頁181。

78 楊翠，〈張彥勳訪談記錄〉，《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63-268。

79 何義麟，〈戰後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禁止政策の変遷——活字メディアの管理政策を中心として〉，古川ちかし、林珠雪、川口隆行編，《台灣・韓国・沖繩で日本語は何をしたのか——言語支配のもたらすもの》（日本東京：三元社，2007.03），頁65。

80 菅野敦志，〈1950年代初期台湾の中国化——「改造」と「中央化」の影響を中心に〉，《日本台湾学会報》10期（2008.05），頁28-29。另《軍民導報》在1952年10月更名為《青年戰士報》。

文外，其他所有報刊應絕對禁止使用日文」。⁸¹但是1951年7月15日，由農復會、美新處與經合會中國分署聯合創辦，針對農民閱讀的《豐年》雜誌，仍然以「中日文合刊」的形式發行，其後雖然逐步將日文欄改為摘要、附錄，但直至1956年底才完全廢除日文。⁸²

上述日文欄位能夠突破官方的意識形態限制而存在，究其原因都在於其刊物本身具有官方色彩。因此，回過來看《潮流》在1948年能夠維持以日文出刊，並且維繫到最後一期「會報」出版仍然如此，仍然具有深沉的寓意。當然，《潮流》能夠使用日文出刊的主要原因是，它始終只是維持著同人誌的性質，而並非正式發行的出版品。此外，《潮流》始終以鋼板油印的方式印製，這個形式也可以迴避尋找日文排版鉛字的困難。但是在語言的自覺選擇上，《潮流》還是具有特殊性。因為同樣是屬於師院本省籍學生創辦的社團刊物，但不管是1949年5月的《龍安文藝》（排版印刷），或者1950年6月的《鄉曲》（油印），目前所見也都是中文刊物（各僅出一期），而沒有日文的部份。

《潮流》使用「中日文合刊」的形式印行，這個現象主要和銀鈴會的負責人朱實有關。在銀鈴會中，朱實和蕭翔文是「最早學會使用中文創作的會員」。⁸³但這些成員裡面，中文能力最好者應該是埔金（陳金河）。《潮流》在1948年「夏季號」上曾經介紹埔金是：「鄉土色彩濃厚的作家。曾長居北平。現正專攻教育學」。⁸⁴但值得注意的是，朱實對於「國文」的學習與運用，亦即當時普遍感染在本省籍知識分子群中的「語言問題」，⁸⁵其實是相當

81 台灣省政府，〈奉電轉飭禁止報刊使用日文仰遵照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秋字36期（1950.08.09），頁441。另《台東新報》幾經更迭後，在1987年8月改名為《自由時報》。

82 王文裕，〈《豐年》雜誌與臺灣戰後初期的農業推廣（1951-1954）〉，《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0期（2011.06），頁1-22。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協辦，2013.05.24-25）。

83 張彥勳，〈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頁23-32。

84 朱實，〈會友音訊〉，「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82-284。

85 關於戰後初期國語、國文與文學創作的討論，可以參考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頁223-270。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7期，頁125-159。

自覺而且富有批判意味的。朱實在創刊的1948年「春季號」上，曾用日文寫道：

此時，我們銀鈴會勇敢地發出再刊之聲。有人說，無法以國語文創作文學者，就沒資格創作文學。這是極其粗暴的言語，不是嗎？讓我們喊出心中的吶喊吧！不管是國文、英文或是日文，總之，能夠表得自己意志的語文就可以！⁸⁶

這個吶喊主要針對的，是當時《新生報》「橋」副刊上已經逐漸升起，圍繞在「台灣新文學」問題的論戰。1948年3月29日，楊逵發表〈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其中建議：「各報副刊編者協助物色翻譯人員從事翻譯工作並揭載以日文寫的文藝作品」。⁸⁷同年4月7日，「橋」副刊刊出〈橋的路：第一次作者茶會總報告〉，日語使用的問題成為會議上論辯的主要話題。4月23日，朱實發表〈本省作家的努力與希望：新文學運動在台灣的意義〉（林曙光翻譯），其中說到：

但是日文廢止的嚴令卻打擊了台灣文壇。我們並不是對日語上在戀戀不捨，可是我們不可忘記，過去五十年間台灣是在異族的統治下。因而在這過渡時期，本省青年在文學上還使用日文是出於不得已的。我們想問在學得國語以前是不是一定要保持沉默？而無權過問文學呢？⁸⁸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話剛好就寫在《潮流》發刊的前夕。因此朱實在這裡所提出的疑問，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是否只有「國語」才能夠被承認是「文學」？但這就更深刻地碰觸到後來所謂「跨越語言」的問題。如果用朱實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們想問在「跨越語言」以前，是不是就無權過問文學呢？如果繼續

86 朱實，〈再刊之際〉，「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210。

87 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陳映真、曾健民編，《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頁45。

88 朱實，〈本省作家的努力與希望：新文學運動在台灣的意義〉，《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77-78。

延伸這個問題，則似乎可以繼續追問：為什麼只有「跨越語言」的文學，才能夠被承認為文學？這應該是朱實堅持在《潮流》上，持續刊出日文創作最根本的原因。

楊達後來在評價《潮流》時曾說：「他（張紅夢）因國文寫不來，就用日文寫作了。文學是為現實的描寫，生活意志的表現，不要限定於什麼語文而中斷這工作」。⁸⁹於是《潮流》在創作與編輯上的具體實踐，部分消解了「國語」的正當性，甚至「跨越語言」的必然性。朱實以文學應該「超越語言」，取代了「跨越語言」。而這才是《潮流》在台灣新文學史上，更為深刻的意涵。當然，朱實最終並沒有否定「跨越語言」，他在文章的最後仍然鼓勵「本省新進作者能夠積極底誠懇的努力於學習國文寫作」。⁹⁰

然而，朱實這種「超越語言」的文學價值觀，其背後更大的支撐能量，是在於銀鈴會同仁對於文學，特別是「世界文學」具有自覺的，而且是充滿自信的理解和想像。這個自信當然來自於「日文」的閱讀和感受。《潮流》1948年「夏季號」，淡星在談論紅夢的詩作時曾說：

日本的文學有深度，但無廣度。中國（魯迅等人是例外）、美國的文學雖然面向廣大，但是沒有深度。唯有俄國文學既有廣度也有深度。我們過去學習了日本文學的深度。我們現在必須學習中國文學的廣度。縮短與俄國文學之間的距離就是中國文學當前的問題。而應要站在第一線的就是我們台灣青年。⁹¹

從這段話應該可以感受到銀鈴會同仁，在《潮流》創辦初期，所展現出來的高昂熱情與自信。他們始終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學」的座標上，想像筆下所創作出來的詩句。而且不分左、右，都是如此。例如埔金在強調「今日的新

89 志仁，〈第一次新文藝座談會記錄〉，《力行報·新文藝》3期（1948.08.16）。轉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頁150。

90 同註88。

91 淡星，〈關於紅夢兄的詩〉，「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上冊，頁339。

現實主義文學」時，他所描繪出來的「世界文藝思潮」背景，就是從「希臘思潮」以降，以至於「新現實主義」的西方歷代文藝思潮的脈絡。⁹²而當微醺在藝術的「美的本質」辯護時，他所強調的是「人類的精神作用」。在考慮「為人民而藝術」的可能性時，他所列舉的是從古代、中世紀、近代到現代「人民到底是如何被壓制」。而在分辨中國文壇的現況時，微醺說：「我沒有資格評論中國的藝術界，但概觀來看，不得不承認中國的藝術還未達到世界的水準」。⁹³我個人認為銀鈴會同仁透過日文的閱讀與創作，想像「文學／世界文學」的高度，才是他們得以「超越語言」的主要憑藉。

根據1950年12月25日，張彥勳在刑警總隊的偵訊筆錄所載，銀鈴會在後期階段共有會員「約百人」，⁹⁴並稱「會員名單於去（38）年二月間被台中市大誠西街四號某機關特務李良彬先生取去，隨即令我停刊」。⁹⁵這是銀鈴會組織被「查獲」的時間，最早的一個記載，而且是在銀鈴會第二次聯誼會（1949年2月1日）之後，「四六事件」之前。「李良彬」為保密局台中組組長的化名。保密局是由軍統局在1946年改制成立，而其任務之一就是「控制各學校工廠之學生、工人，為奸匪所利用，而弭止工潮學潮於無形」。⁹⁶但事實上，在「李良彬」取走銀鈴會名單之後，《潮流》仍然繼續刊行。

不久之後，四六事件爆發，直接導致了銀鈴會的瓦解。雖然在1949年5月，透過陳素吟的安排掩護，《會報》第二號還是如期出刊，但隨著朱實遭到通緝、逃亡，實際上銀鈴會成員的活動已經無法延續。1947年7月21日，逃亡

92 埔金，〈文學隨感〉，「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326-330。

93 微醺，〈人民、現實、藝術〉，「銀鈴會同人誌翻譯計畫」工作小組譯，《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下冊，頁241-246。

94 我個人認為銀鈴會員「約有百人」的筆錄記載，並不一定可信。1948年8月14日，張彥勳在參加楊逵主持，《力行報》舉辦的「第一次新文藝座談會」上，曾說銀鈴會員「共三十人」，這應該是比較準確的數目。參見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資料卷》，頁150。閱讀當時官方檔案，仍須注意「冤錯假案」的問題，相關前行研究可參閱蘇慶軒，〈國家建制與白色恐怖：五〇年代初期臺灣政治案件形成之原因〉（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95 國家檔案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張彥勳偵訊筆錄」（檔號：0039/340.2/ 5502.3 /13/003）。

96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09），頁17。

中朱實突然返家，告知錦連《潮流》還是要「暫時停刊」。⁹⁷這應該就是《潮流》終止的確切時間。1950年12月30日，台中縣警察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立案成立，⁹⁸銀鈴會正式瓦解。

銀鈴會和《潮流》在戰後初期的文學史發展中，立處於非常鮮明而且獨特的位置上。這群年輕的本省籍知識分子，大部分活躍在1948年的師範學院。在他們創辦《潮流》的一年以前，是殘殺了大量本省籍菁英的「二二八事件」。而迫使他們結束《潮流》的主要原因，則是開啟白色恐怖序幕的「四六事件」。他們或許想引領潮流，卻最終不能自主地還是被歷史的潮流所吞沒；他們或許也想單純地從事文學創作，但是創作背後所隱匿的殘酷現實，卻仍然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可抹滅的烙印，甚至讓許多人背負了終身的闇傷與陰影。



97 錦連，《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頁102-103。

98 國家檔案局，「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檔號：0039/340.2/5502.3/13/003）。原件可參閱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頁220。張瑜珊論文的附件檔案雖經篩選，但由於其申請時間是在《個資法》施行之前，部分人事資料沒有被遮蔽，因此仍具重要參考價值。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古瑞雲，《臺中的風雷》（台北：人間出版社，1990.09）。
- 古川ちかし、林珠雪、川口隆行編，《台湾・韓国・沖縄で日本語は何をしたのか——言語支配の言語支配のもたらすもの》（日本東京：三元社，2007.03）。
- 周華斌主編，《銀鈴會同人誌》上、下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11）。
- 林亨泰編，《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06）。
- 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02）。
- 封德屏編，《臺灣文學期刊史導論》（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12）。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06）。
-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合著，《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06）。
- 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05）。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
-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1945-1949）：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文化事業公司，2007.01）。
- 陳映真、曾健民編，《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
- 曾健民編，《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09）。
-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07）。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署職員錄》（台北：臺灣總督府，1944.01）。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1995.06）。
- 鄭焯明編，《越浪前行的一代：葉石濤及其同時代作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2.02）。

- 錦連，〈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09）。
-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冊（台北：前衛出版社，2009.12）。
-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中：晨星文化出版社，2000.04）。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N生，〈編輯者雜記〉，《銀鈴》1期（1938.06），頁78。
- 上村ゆう美，〈銀鈴會の投稿活動〉，《日本台湾学会報》6期（2004.05），頁1-24。
- 王文裕，〈《豐年》雜誌與臺灣戰後初期的農業推廣（1951-1954）〉，《高雄師大學報 人文與藝術類》30期（2011.06），頁1-22。
- 本刊，〈新日本音樂皇軍感謝の夕〉，《臺灣公論》（1942.05），頁65。
- ，〈銀鈴會演奏會〉，《臺灣藝術新報》3卷4期（1937.04），頁5。
- 本社，〈銀鈴俱樂部會員氏名〉，《銀鈴》1期（1938.06），頁67-69。
-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台灣史研究》21卷3期（2014.09），頁1-64。
- 林亨泰，〈「銀鈴會」的史話〉，《臺灣文藝》118期（1989.07），頁6-12。
- 根本虎雄，〈創刊の辭〉，《銀鈴》1期（1938.06），頁3。
- 張彥勳，〈荊棘之路：兼談創辦銀鈴會的經過〉，《笠》4期（1964.12），頁14-15。
- ，〈從「銀鈴會」到「笠」〉，《笠》100期（1980.12），頁30-33。
- ，〈探討「銀鈴會」時代的重要詩人及其創作路線〉，《笠》111期（1982.10），頁35-43。
- ，〈銀鈴會「潮流」作品簡介〉，《文學界》16-17期（1985.11-1986.01），頁73-87、104-116。
- 梅家玲，〈戰後初期臺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魏建功與臺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集刊》7期，頁125-159。
-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思與言》29卷4期（1991.12），頁155-184。
- 菅野敦志，〈1950年代初期台湾の中国化——改造」と「中央化」の影響を中心

- に〉，《日本台湾学会報》10期（2008.05），頁17-38。
-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頁223-270。
- 瘴弦，〈民國以來新詩史料初編：日據時期臺灣日文詩刊〉，《創世紀詩刊》47期（1978.05），頁62-64。
- 台灣省政府，〈奉電轉飭禁止報刊使用日文仰遵照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秋字36期（1950.08.09），頁441。
- ，〈電希轉飭嚴緝奸嫌曹潛等廿名歸案〉，《臺灣省政府公報》秋字3期（1949.07.01），頁37。
- 簡弘毅，〈跨越歷史的相會：專訪「銀鈴會」成員朱實先生〉，《台灣文學館通訊》33期（2011.12），頁128-131。

（二）學位論文

- 張瑜珊，〈「邊緣」或「潮流」：從「銀鈴會」討論跨語一代的發生與發聲〉（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蘇慶軒，〈國家建制與白色恐怖：五〇年代初期臺灣政治案件形成之原因〉（台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大塚ゆう美，〈台湾の戦前と戦後を繋いだ文学活動：楊逵と銀鈴会を中心に〉（日本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6）。

（三）研討會論文

- 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協辦，2013.05.24-25）。

三、報紙文章

- 林亨泰，〈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自立晚報》，1985.05.04，10版。
- 本刊，〈銀鈴會彈初め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01.14，2版。
- ，〈銀鈴會の彈初め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01.12，7版。
- 志仁，〈第一次新文藝座談會記錄〉，《力行報・新文藝》3期，1948.08.16。

四、電子媒體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五、其他

國家安全局，拂塵專案第十三卷附件：「銀鈴會之組織及活動情形」（檔號：0039/340.2/5502.3/13/002）、「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檔號：0039/340.2/5502.3/13/003）、「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之偵訊報告表：張彥勳偵訊筆錄」（檔號：0039/340.2/5502.3/13/003）、「銀鈴案與匪偽台盟之調查資料」（檔號：0039/340.2/5502.3/13/004）。

